

缺失的父爱?

——母亲陪读对农村父亲育儿参与的影响

罗必良 刘诗羽

摘要:送子女进城读书逐渐成为农村家庭的刚性选择,由此产生的母亲陪读和“父职缺席”受到学界的大量关注。基于农村家庭抚育模式变迁的视角,利用CFPS数据实证分析母亲陪读对农村父亲育儿参与的影响。研究表明:在中国特有的农村母亲陪读情境中,“父职缺席”表现出了与以往研究不一样的特征。尽管农村陪读家庭存在显著的育儿时间性别差异,即“父职物理缺席”,但其亲子交流等情感陪伴频率更高。机制分析发现,母亲陪读通过提升经济压力和教育期望间接影响农村父亲育儿参与的时间和质量。异质性分析发现,母亲陪读对父亲育儿参与的负向影响在收入较低的农村家庭中更为强烈。因此,未来应重点关注并采取有效措施化解母亲陪读现象给农村家庭造成的不利影响,同时辩证地看待中国农村家庭的“父职缺席”。

关键词:农村家庭; 母亲陪读; 父职缺席; 父亲育儿参与; 家庭抚育模式

DOI: 10.19836/j.cnki.37-1100/c.2025.03.008

一、引言

已有研究表明,父亲更多地参与家庭抚育过程,与妻子合力进行协作式育儿,不仅有助于培养健康的亲子关系,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提高孩子的学业成绩,还有利于孩子身心健康等综合素质的长期提升,因而是一种能够增进跨期收益的家庭隐形投资^①。与之对应,有关父亲缺席育儿过程对儿童成长和家庭发展的不良影响,则日益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②③}。事实上,在中国,因传统性别规范的延续,尤其是“男主外,女主内”家庭分工模式的传承,育儿等无偿照料责任被更多地分派给母亲,父亲则负责提供经济支持,从而缺席家庭抚育过程。据《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的数据,我国城乡家庭父母双方共同照料和共同教育子女的比重仅为7.5%和11.7%^④,表明我国城乡家庭的子女养育过程普遍存在较为严重的低父亲参与率,即“父职缺席”^⑤。现实中,“父职缺席”包含“物理意义”和“情感意义”两个维度,前者指的是父亲日常陪伴和照料孩子的次数较少,育儿参与时间较短;后者指的是父亲忽视和缺少与孩子的互动和情感交流,育儿参与质量较低^⑥。近年来,尽管我国城乡家庭中父亲的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及其协调研究”(7193300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非农转移、代际转换与农地撂荒发生机理研究”(72203064);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博士论文奖学金项目(202406)。

作者简介:罗必良,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 510642; luobl@scau.edu.cn);刘诗羽(通讯作者),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广州 510642; 982553583@qq.com)。

① 甘颖:《家庭再生产与父母协作式育儿》,《中国青年研究》2022年第7期。

② 许琪、王金水:《爸爸去哪儿? 父亲育儿投入及其对中国青少年发展的影响》,《社会发展研究》2019年第1期。

③ McLanahan S., Tach L., Schneider D., “The Causal Effects of Father Absenc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13, 39, pp. 399-427.

④ 《2015中国家庭发展报告:家庭规模变小 父亲角色发挥不足》,http://china.cnr.cn/ygxw/20150513/t20150513_518544788.shtml, 访问日期:2025年3月15日。

⑤ 陈雯:《亲职抚育困境:二孩国策下的青年脆弱性与社会支持重构》,《中国青年研究》2017年第10期。

⑥ 杜世超:《物理缺席与情感失联——21世纪美国社会学界父职缺席研究综述》,《社会学评论》2024年第2期。

育儿参与率有所提升,但其参与水平仍明显低于母亲,参与质量也有待提升,且不具有社会普遍性^①。而且,不可否认的是,农村家庭的“父职缺席”现象比城市家庭更为严重^②。

随着农村劳动力大规模的非农转移与工资性收入的提高,农村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投资呈稳定增长态势。在城乡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的背景下,送子女进城读书已逐渐成为农村家庭的刚性选择^③。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对目前暂时缺乏进城买房和定居能力的普通农村家庭来说,在给进城读书的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的同时方便监督其学业,家长进城陪读成为更多农村家庭的选择^④,而这一选择可能是加剧农村家庭“父职缺席”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对经济条件有限的普通农村家庭而言,父母双方无法在工作之余共同参与育儿过程。在家庭内部性别分工模式下,往往由孩子母亲主要负责陪读^⑤,而父亲迫于激增的家庭生计压力不得不外出务工或提高工作强度,从而减少照顾孩子的时间,在客观上导致了育儿过程中的“父职物理缺席”。另一方面,陪读将农村母亲束缚于家庭无偿照料责任中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农村父亲的家庭经济支柱地位,致使其容易把提供经济资源当成自身首要职责而忽视家庭情感陪伴,从而降低其育儿参与质量,造成“父职情感缺席”。

可以认为,追求收入与抚育子女的矛盾,工作与家庭的冲突,陪读造成的人户分离,几乎成为普通农村家庭共同面临的问题,也是社会治理的重大议题。现有文献多关注城市家庭的工作-家庭冲突和育儿压力,却鲜有文献重视普通农村家庭的育儿性别差异和可能面临的“父职缺席”抚育困境。因此,基于农村家庭抚育模式变迁的视角和中国特有的陪读情境并对此进行探讨的研究边际贡献在于以下两点:(1)关注教育城镇化背景下母亲陪读对农村家庭父亲育儿参与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特征,并从数量和质量两个层面对其育儿参与情况进行衡量,补充了中国农村经验。(2)揭示陪读现象导致农村家庭育儿过程中“父职缺席”的形成机理,丰富了相关的研究内容。

二、理论分析

(一)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策略与抚育模式变迁

受中国以代际支持为典型特点的家庭文化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城镇化浪潮中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外出务工,农村祖辈协助育儿的重要性逐步凸显。加之农村地区公共幼托服务供给水平普遍较低,出于节省家庭育儿成本和减轻青壮年生活压力等方面的考虑,祖辈参与隔代照料成为农村家庭的理性选择^⑥。

然而,在教育竞争加剧与教育责任日趋家庭化的背景下,隔代育儿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教育环境,并且,随着隔代育儿模式可能导致的家庭内部冲突^⑦及其对儿童的学业成绩、能力培养等方面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日益增强^⑧,父母协作式育儿模式开始被倡导并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与此同时,随着女性工作参与率和社会地位的提高,父权制背景下“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性别规范被修

① 王雨磊:《父职的脱嵌与再嵌:现代社会中的抚育关系与家庭伦理》,《中国青年研究》2020年第3期。

② 段朱清、靳小怡、杜巍:《家庭人口禀赋对城乡夫妻抚幼投入与分工的影响——基于西部县域调查数据的分析》,《人口学刊》2022年第3期。

③ 张欢、朱战辉:《农村青少年教育城镇化的家庭策略、实践困境及其出路》,《中国青年研究》2021年第1期。

④ 张一晗:《教育变迁与农民“一家三制”家计模式研究》,《中国青年研究》2022年第2期。

⑤ 田北海、黄政:《陪读比较优势、家庭利他主义与农村陪读母亲的形成——基于L镇的实地调查》,《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⑥ 韩华为、葛鸿熙:《隔代照料对农村祖辈健康的影响效应及其性别差异》,《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

⑦ Han W. J., Whetung T., Mao X., “One Roof, Three Generations: Grandparental Co-residence and Child Outcomes in China”, *Family Process*, 2020, 59(3), pp. 1144-1160.

⑧ 沈奕斐:《隔代育儿对儿童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述评》,《妇女研究论丛》2023年第3期。

正,父亲被要求承担更多的育儿责任。特别是在一系列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实施之后,社会各界普遍认识到生育、抚育、教育不仅是母亲的责任,父亲的育儿责任及其在家庭抚育方面的实际参与也尤为重要。然而,对普通农村家庭来说,父母协作式育儿模式在短期内仍然难以实现。

一方面,在农业收入有限的情况下,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得不外出务工以增加收入,由此导致的亲子分离使得父母双方无法在工作之余参与育儿过程,隔代照料或母亲留守育儿仍然是许多农村家庭的最优选择。另一方面,在城乡教育资源配置不均以及农村家庭教育观念优化等因素所引致的教育城镇化背景下,送子女进城读书并且由专门的家庭成员在孩子就读的城镇租房或买房以照料和监督孩子的日常生活和学习,即进城陪读,已成为农村家庭可及性较强的教育投资,并且逐渐兴起和日益普遍^①。其中,对普通农村家庭而言,选择租房陪读的可能性最大^②,但由此所产生的额外生活开支,无疑大大增加了农村家庭的经济负担,其有限支付能力不可能支撑孩子的父辈和祖辈同时陪读。因此,迫于母职属性的家庭内部性别分工,孩子的母亲往往成为陪读责任的主要承担者,并肩负着更为沉重的子女教养负担和精神压力^③,进一步加剧了孩子的父亲在育儿过程中的角色缺席及其产生的消极影响。由此,提出假说1。

假说1:母亲陪读凸显了农村家庭的育儿性别差异,进一步加剧了“父职缺席”。

(二)母亲陪读与农村父亲“物理缺席”

在农村教育改革和县城城镇化的发展趋势下,大量优秀教育资源加速向县城的聚集以及农村家庭教育期望的提高,共同推动了大批农村生源向县城转移^④。然而,具有优质教育机会的地方往往未必同时具有优质就业机会。事实上,当前农村生源的流动多以本村周边的乡镇或县城的学校为主,而相对于大中城市,乡镇和县城就业机会有限,农村母亲进城陪读很难实现工作家庭两不误^⑤。由此不可避免地导致家庭经济压力激增,迫使农村陪读家庭中的父亲不得不前往单位劳动报酬更高的地区寻找工作^⑥,由此造成的亲子生活空间分离必然导致“父职物理缺席”。因此,本文主要讨论的是父子共同居住的情景下,孩子进城求学所伴生的母亲陪读对农村家庭父亲育儿参与的影响。

事实上,即使父亲在孩子学校所在地务工并与孩子共同居住,农村陪读家庭的父母也无法在工作之余共同参与到育儿过程之中,因为其平衡工作与家庭关系所面临的时间冲突问题是难以解决的。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指出,劳动力市场中的工作往往是“贪婪的”,即工作时间最长、灵活性最低的工作的薪酬远高于其他种类的工作。因此,为了追求家庭收入的最大化,普通家庭夫妻中的一方必然要将主要精力放在事业发展上而不得不从事“贪婪的工作”^⑦。“预防性劳动力供给”理论同样认为,个体会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来规避未来收入预期不稳定等一系列风险^⑧。众所周知,我国的农民工多从事不稳定、高风险、低报酬的工作,加之租房陪读等因素致使家庭经济压力激增,青壮年男

① 陈锋、梁伟:《生命历程视角下农村家长陪读经历及其影响研究——基于甘肃华县的实地调查》,《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② 庞晓鹏、龙文进、董晓媛等:《农村小学生家长租房陪读与家庭经济条件——学校布局调整后农村小学教育不公平的新特征》,《中国农村观察》2017年第1期。

③ 刘诗羽、罗必良:《母亲陪读、密集母职及其生育效应——来自中国农村母亲的证据》,《南方经济》2024年第7期。

④ 安永军:《生源流动、教育资源重组与城乡义务教育失衡——基于甘肃N县的案例研究》,《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⑤ 刘诗羽、罗必良:《陪读会促进农村女性非农就业吗?——来自中国农村母亲的证据》,《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

⑥ 李永萍:《“一家三制”:教育城镇化背景下的亲代陪读与农民家庭形态调适》,《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2年第6期。

⑦ 克劳迪娅·戈尔丁:《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颜进宇、颜超凡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4年,第10—11页。

⑧ Low H. W., “Self-insurance in a Life-cycle Model of Labor Supply and Savings”,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2005, 8(4), pp. 945-975.

性劳动力尤其是孩子父亲,不得不刻意延长工作时间并选择从事工作强度较大的工作,以获取更高的劳动收入^①。特别是近年来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低技能劳动力创造了大量就业门槛低的新型灵活就业就业岗位,也为农村父亲规避送孩子进城求学与陪读的教育投资风险提供了“贪婪工作”的可能性。据此,提出研究假说2。

假说2:母亲陪读导致农村家庭经济压力激增促使父亲更为艰辛地工作,不得不减少育儿时间,加剧农村家庭抚育中的“父职物理缺席”。

(三)母亲陪读与农村父亲“情感缺席”

中国传统家庭的性别分工是“男主外,女主内”,男性普遍被认为应该扮演家庭中经济资源供给者的角色,却并未被要求参与具体的家庭内部事务,儿童照料和抚育工作更多的被当作女性的责任。贝克尔(Becker)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是家庭成员出于生物学差异,以及受到社会性别规范影响的人力资本投资差异,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所进行的专业化分工,是追求家庭收益最大化的结果^②,即相对于男性,女性在教养子女等家庭内部事务上更具优势,从而更多地承担起这些责任。

在陪读过程中,迫于急剧增长的家庭经济压力,部分陪读母亲通常会利用每日碎片化时间,选择在孩子学校所在地务工或兼职来“以工养学”^③,但这类有偿劳动价值通常被认为是辅助的、次要的,而照顾子女等家庭无偿照料责任才是核心的、首要的^④。多数的情形是,陪读家庭中的父亲负责为妻儿的生活提供经济支持,母亲的主要责任是陪护孩子,负责孩子的学习监督与生活照料。受传统性别规范的影响,孩子父亲容易把提供经济支持当作自身首要职责而忽略家庭情感陪伴。但随着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幼有所育”以及我国生育政策的不断优化,倡导父亲回归家庭抚育的呼声逐渐增强。学界普遍认识到,父职参与不仅限于为子女提供经济保障等经济维度,父亲是否能够通过与孩子及其老师等周围人的交流互动为孩子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更是衡量父职参与质量的重要维度^⑤。据此,进一步提出研究假说3。

假说3:母亲陪读强化了农村父亲在家庭中的经济支柱地位,致使其容易忽视亲子交流等家庭情感陪伴的重要性,进而加剧家庭抚育中的“父职情感缺席”。

然而,母亲陪读背后蕴含的是普通农村家庭“望子成龙”的高教育期望。现代社会信息的广泛交流和人口的频繁流动,使得农村父母能够借此开阔视野,弥补其人力资本积累的不足,进而改善其教育观念。众多研究发现,拥有外出务工等流动经历的农村父母,容易受到城镇地区较高教育回报的激励以及城市经济文化环境和观念的影响,提高其对教育投资的认可程度和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并且逐渐意识到相较于经济投入,亲子间的密切交流、情感陪伴等家庭教育时间投入对子女提高学业成绩乃至其长远发展更为关键^⑥。在陪读过程中,农村母亲对孩子的日常照料和情感陪伴是毋庸置疑的,而农村父亲同样也会受到陪读氛围和周边环境的影响,逐步认可家庭教育时间投入的重要性并提高教育期望,从而增加其育儿情感投入。据此,提出研究假说4。

假说4:母亲陪读作为家庭教育投资,能够有效提高农村父亲的教育期望,增加其与孩子互动交流等情感陪伴的频率,进而减轻家庭抚育中的“父职情感缺席”。

① 杨青、徐俊杰、王洪卫:《房租负担对农民工劳动供给的影响——基于农民工“效益观”的视角》,《农业技术经济》2021年第7期。

② 贝克尔:《家庭论》,王献生、王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32—43页。

③ 蒋宇阳:《从“半工半耕”到“半工伴读”——教育驱动下的县域城镇化新特征》,《城市规划》2020年第1期。

④ 吴惠芳、吴云蕊、陈健:《陪读妈妈:性别视角下农村妇女照料劳动的新特点——基于陕西省Y县和河南省G县的调查》,《妇女研究论丛》2019年第4期。

⑤ 王亮:《“新父职”研究:概念厘清、理论脉络与研究展望》,《中国青年研究》2022年第6期。

⑥ 李佳丽、何瑞珠:《家庭教育时间投入、经济投入和青少年发展: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影子教育阐释》,《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第8期。

三、数据、变量与计量模型

(一)数据来源

主要变量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自2010年起,CFPS每两年一次对中国城乡家庭开展动态追踪调查,目前该调查已更新至2022年,但由于2020年和2022年之前的五期调查并未询问有关育儿时长的问题,因此仅采用2020年和2022年两期数据进行分析。具体来说:首先,从少儿库中筛选出就读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儿童样本;其次,根据其对应的父母样本编码与成人库和家庭库中的数据进行匹配,在仅保留农业户口、已婚并剔除1970年以前出生^{①②}和主要变量数据缺失严重的样本后,最终共获得5107个有效父母样本,其中男性样本2147个,女性样本2960个。人均GDP和失业率等地区变量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份统计年鉴。

(二)变量设置及说明

1.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为育儿参与情况,分别从“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进行衡量。对于“数量”,选取“照顾孩子时长”来衡量,具体来自CFPS成人问卷中“一般情况下,您每天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如照料、陪伴、教育等,大约有几个小时?”这一问项;对于“质量”,选取“亲子交流频率”来衡量,具体来自“您和这个孩子讨论学校里的事情的频率如何?”这一问项。

2.核心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为农村母亲陪读,主要来自“孩子是否寄宿”“孩子学校所在地”“孩子母亲是否从事农业工作”“白天/晚上孩子由谁照管”这几个问项,如果答案分别是“否”“除农村(包括乡镇)外”“否”“孩子的妈妈”,则母亲陪读变量赋值为1,否则为0^③,以体现农村母亲陪读“空间上离乡、职业上离农、生活上以子代为重”这三个基本特征^④。

3.控制变量。控制变量包括个体、家庭、地区层面的变量。其中,个体层面包括受访者本人和配偶的年龄、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非农就业情况、外出务工经历等;家庭层面包括子女照料压力、未成年子女数目、隔代照料支持情况、与孩子共同居住时长、家庭人均纯收入、教育支出占比等;地区层面则包括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失业率以及地区虚拟变量等^⑤。

(三)特征事实

表1描述了父母的工作强度以及育儿参与与性别差异。可以发现:(1)相对于没有陪读的农村家庭,农村陪读家庭的父亲具有更高的非农就业率、更长的每周工作时间、更高的工作强度、更短的育儿时间,但其亲子交流频率更高;(2)农村陪读家庭存在显著的育儿参与与性别差异,相较于父亲,母亲的非农就业概率更低、每周工作时间更短、工作强度更低、育儿时间更长。

表1 工作强度和育儿参与差异

变量	非农就业占比	每周工作时长	上夜班频率	照顾孩子时长	亲子交流频率	
陪读	否	0.712	55.572	2.616	1.909	3.462
	是	0.935	59.562	2.807	1.645	3.770

① 陪读家庭中的父辈普遍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

② 王晓慧、刘燕舞:《家庭视角下的农村陪读现象研究——基于湖南省Y村陪读教育史的个案考察》,《农业经济问题》2024年第8期。

③ 在样本中,母亲陪读=1的观测值占14.4%。

④ 许加明:《农村中小学陪读现象的形成机制及其社会后果》,《湖北社会科学》2018年第12期。

⑤ 因篇幅限制,变量设置及描述性统计表并未汇报,感兴趣者可联系作者。

续表 1

变量		非农就业占比	每周工作时长	上夜班频率	照顾孩子时长	亲子交流频率
	Diff	-0.223***	-3.991***	-0.191	0.263**	-0.308***
	t值	-8.038	-2.844	-1.282	2.042	-4.962
观测值(男=1)		2145	2086	1587	1037	2145
性别	女	0.775	47.803	1.993	4.844	3.840
	男	0.935	59.562	2.807	1.645	3.770
	Diff	-0.161***	-11.760***	-0.813***	3.199***	0.070
	t值	-5.817	-7.061	-4.495	9.499	1.032
观测值(陪读=1)		733	585	566	462	733

注:每周工作长时的单位为小时/周,照顾孩子长时的单位为小时/天。

(四)模型设定

为了识别母亲陪读对农村家庭育儿参与情况的影响,设置如下模型:

$$Parent_{it} = \alpha_0 + \alpha_1 mom_{it} + \gamma X_{it} + \epsilon_{it}$$

其中,被解释变量 $Parent_{it}$ 表示父母 i 在 t 年的育儿参与情况; mom_{it} 表示父母 i 所在家庭 t 年是否由孩子母亲进行陪读; X_{it} 表示控制变量,包括个体、家庭和地区特征层面的变量; α_0 为常数项, α_1 和 γ 为待估参数; ϵ_{it} 为误差项。

由于“照顾孩子时长”为连续型变量,且样本中存在大量的左归并(归并点为0)现象,故基准回归采用 Tobit 模型进行估计;而“亲子交流频率”为有序变量,因此基准回归使用有序 Probit 模型进行估计。

四、模型结果与分析

(一)母亲陪读与农村家庭育儿性别差异

在基准回归部分,引入核心解释变量与性别的交互项来考察农村陪读家庭育儿参与情况的性别差异,具体结果见表 2^①。

首先,考察农村陪读家庭育儿参与“数量”维度的性别差异。表 2 第(1)列和第(2)列在依次加入性别与母亲陪读交互项和省份虚拟变量之后,母亲陪读的系数均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性别及其与母亲陪读交互项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从育儿参与“数量”维度来看,农村陪读家庭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即母亲陪读显著抑制了农村父亲的育儿时长,扩大了育儿性别差异,加剧了农村家庭抚育中的“父职物理缺席”。此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理论预期和现有研究基本一致。其次,考察农村陪读家庭育儿参与“质量”维度的性别差异。表 2 第(3)列和第(4)列结果显示,母亲陪读的系数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性别及其与母亲陪读交互项的系数为负但不具有显著性,表明从育儿参与“质量”维度来看,农村陪读家庭更为重视亲子交流等情感陪伴,亲子交流频率和育儿参与质量更高,且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父职情感缺席”并不严重。

① 鉴于 CFPS2020 和 2022 年数据中用于刻画被解释变量“照顾孩子时长”的样本存在大量缺失值,为保障样本代表性,基准回归部分将其全部赋值为 0 进行估计,但这实则是对样本育儿时长的低估。为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将“照顾孩子时长”变量中的缺失样本进行剔除,采用缩减后的样本量进行再估计,发现母亲陪读变量及其与性别的交互项仍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研究结论稳健。相关结果因篇幅限制并未汇报,感兴趣者可联系作者。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照顾孩子时长		亲子交流频率	
	(1)Tobit	(2)Tobit	(3)Oprobit	(4)Oprobit
母亲陪读	0.594***(0.187)	0.998***(0.247)	0.279***(0.047)	0.287***(0.060)
性别	-2.510***(0.161)	-2.370***(0.169)	-0.054(0.036)	-0.056(0.038)
母亲陪读×性别		-0.910***(0.341)		-0.056(0.091)
年龄	-0.141***(0.024)	-0.141***(0.024)	-0.005(0.005)	-0.006(0.005)
配偶年龄	-0.133***(0.024)	-0.134***(0.024)	-0.011*(0.005)	-0.009*(0.005)
健康状况	-0.086(0.061)	-0.084(0.061)	0.022(0.014)	0.026*(0.014)
受教育年限	0.063***(0.021)	0.056***(0.021)	0.032***(0.003)	0.033***(0.005)
是否有非农就业	-1.013***(0.162)	-1.082***(0.162)	0.018(0.035)	0.053(0.036)
外出务工经历	0.350***(0.145)	0.337***(0.144)	-0.005(0.034)	-0.009(0.034)
未成年子女数目	0.963***(0.063)	0.930***(0.065)	-0.057****(0.013)	-0.044****(0.014)
子女照料压力	2.875****(0.247)	2.828****(0.247)	0.038(0.051)	0.064(0.051)
与孩子同住	0.085****(0.016)	0.091****(0.016)	0.007*(0.004)	0.006(0.004)
隔代照料支持	-1.201****(0.214)	-1.166****(0.212)	-0.244****(0.047)	-0.249****(0.048)
家庭人均纯收入	-0.589****(0.110)	-0.592****(0.112)	-0.004(0.025)	-0.005(0.025)
教育支出占比	-0.167(0.793)	-0.184(0.811)	-0.156(0.189)	-0.196(0.196)
家庭总支出	0.318****(0.101)	0.302****(0.101)	0.011(0.025)	0.007(0.025)
ln人均GDP	-0.298(0.226)	-0.739(0.707)	-0.026(0.050)	0.917****(0.184)
失业率	-0.689****(0.146)	-0.101(0.305)	0.007(0.033)	-0.144*(0.082)
省份虚拟变量	否	是	否	是
常数项	16.43****(2.701)	15.237*(8.400)	—	—
R ²	0.092	0.097	0.019	0.029
观测值	5079	5079	5107	5107

注:第(1)(2)列为边际效应值; *、**和***分别表示在10%、5%及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二)内生性问题处理:基于工具变量法的再检验

为有效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表3仅针对男性样本,采用工具变量法重新回归。选取样本所在省份上一年度的“普通高校本科招生数所占比重”(本科招生数/普通高校总招生数)和“所在村庄是否有中小学”(是=1;否=0)作为农村母亲陪读的工具变量。前者来自相关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衡量了该省份某一年度的高考本科录取难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村家庭为“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而送子女进城读书和母亲陪读的概率,同时它不直接影响农村父亲的育儿参与;后者来自CFPS2014的村居问卷,根据村庄代码匹配所得。2001—2012年各地政府对乡村中小学校布局进行调整,导致乡村中小学被大量撤并,所在村庄没有中小学提高了该村学生进城读书和母亲陪读的概率,并且它不直接影响农村父亲的育儿参与情况。因此,上述两个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要求。

表3第(1)列和第(2)列分别使用IV-Tobit和2SLS模型重新估计母亲陪读对农村父亲育儿参与时间的影响;由于不能直接对有序Probit模型使用工具变量法,表3第(3)列采用CMP估计法重新估

计母亲陪读对农村父亲与孩子交流频率的影响。以第(2)列2SLS的回归结果为例,DWH检验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表明核心解释变量“母亲陪读”的确存在内生性,而弱工具变量检验和识别不足检验则表明,采用的工具变量不存在弱工具变量和识别不足的问题。从表3估计结果可看出,母亲陪读显著抑制了农村父亲的育儿时长,但未显著降低其与孩子的交流频率,表明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表3 工具变量法

变量	照顾孩子时长		亲子交流频率
	(1)IV-Tobit	(2)2SLS	(3)CMP
母亲陪读	-4.083*(1.678)	-1.171*(0.641)	0.514(0.337)
控制变量和常数项	是	是	是
本科招生比	0.387*** (0.096)	0.260** (0.115)	1.711*** (0.610)
村里是否有中小学	-0.076*** (0.018)	-0.090*** (0.013)	-0.599*** (0.104)
Kleibergen-Paap rk LM	—	50.258***	—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	20.187	—
DWH test	—	4.314**	—
观测值	2140	2140	2147

(三)机制检验

送孩子进城读书和母亲陪读导致的家庭经济负担激增,可能促使农村父亲更艰辛地工作,并强化其家庭经济支柱地位,致使其育儿时间减少,且容易把提供经济支持当作自身主要责任而忽视亲子交流等家庭情感陪伴的重要性,从而加剧“父职缺席”。然而,母亲陪读本身作为一种农村家庭教育投资,背后蕴含的是对子女的高教育期望。在此背景下,农村父亲可能逐渐意识到相较于经济支持,父母陪伴等家庭教育时间投入对子女提高学业成绩乃至其长远发展更为关键,从而提高其与孩子情感交流的频率,弥补其“情感缺席”。有鉴于此,将农村陪读家庭的“经济压力”^①、农村父亲“个人收入占比”^②和“教育期望”^③作为中介变量依次纳入模型,以考察母亲陪读对农村父亲育儿参与“数量”和“质量”影响的作用机制。

首先,表4第(1)列结果表明母亲陪读加剧了农村家庭的经济压力和生计负担;第(2)列和第(3)列则进一步针对男性样本,检验“经济压力”在母亲陪读影响农村父亲育儿时间中所发挥的作用,结果表明农村陪读家庭的经济压力越重,孩子父亲的工作强度就越大,即每周工作时间越长、周末上班频率越高,这会对其育儿时间产生挤出,加剧“父职物理缺席”。其次,表5第(1)列和第(2)列回归结果显示农村陪读家庭中的父亲,其个人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更大,具有更高的“经济支柱”地位,并且对孩子有更高的教育期望;第(3)列则进一步将农村父亲“个人收入占比”和“教育期望”作为中介变量纳入模型,检验其在母亲陪读影响农村父亲与孩子交流频率中的作用,结果显示教育期望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而“个人收入占比”的系数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表明农村陪读家庭对子女的高教育期望,使农村父亲更加重视亲子交流等家庭情感陪伴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从而减轻“父职情感缺席”问题。

① “经济压力”为二值变量,若家庭总收入小于家庭总支出,赋值为1;否则为0。
 ② 农村父亲个人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
 ③ 希望孩子的受教育程度(小学=3;初中=4;高中/中专/技校/职高=5;大专=6;大学本科=7;硕士=8;博士=9)。

综上所述,农村陪读家庭沉重的经济压力迫使农村父亲更为艰辛地工作,从而挤出其育儿时间,是“父职物理缺席”的重要影响机制;但“望子成龙”的高教育期望,提高了父亲与孩子交流等情感陪伴的频率,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父职情感缺席”问题。假说2和假说4得以验证。

表4 父职参与“数量”机制检验^①

变量	经济压力	每周工作时长取对数	周末上班频率
	(1)IV-Probit	(2)OLS	(3)Oprobit
母亲陪读	1.394***(0.348)	0.005(0.046)	-0.282**(0.138)
经济压力	—	-0.046(0.031)	-0.190**(0.090)
母亲陪读×经济压力	—	0.118**(0.058)	0.433**(0.181)
控制变量/工具变量	是	是/否	是/否
R ²	—	0.075	0.025
观测值	5107	2088	1590

表5 父职参与“质量”机制检验

变量	个人收入占比	教育期望	亲子交流频率
	(1)OLS	(2)CMP	(3)CMP
母亲陪读	0.074**(0.032)	0.965***(0.207)	0.482(0.355)
个人收入占比			0.068(0.071)
教育期望			0.088***(0.034)
控制变量/工具变量	是/否	是	是
R ²	0.087	0.028	0.023
观测值	1385	2133	1343

五、进一步分析

(一)基于家庭经济条件的考察

农村劳动力把经济收益当作其首要的劳动目的,因此其往往会迫于家庭经济压力而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相比于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村家庭,经济条件较差家庭的男性劳动力在经济压力激增的背景下,更可能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以赚取补偿性收入,进而损失其参与育儿和陪伴孩子的时间。因此,本部分针对男性样本,基于家庭人均收入分位数^②对母亲陪读与农村家庭父亲育儿参与之间的关系进行再考察。表6第(1)列和第(2)列估计结果显示,当家庭人均收入处于中位数以下时,母亲陪读显著降低了农村父亲的育儿时长;当家庭人均收入处于中位数以上时,母亲陪读变量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表明对经济资本较为匮乏的农村陪读家庭而言,“父职物理缺席”更为严重。第(3)列和第(4)列结果显示,家庭人均收入无论高低,母亲陪读对亲子交流频率的回归系数始终显著为正,表明农村陪读家庭的“父职情感缺席”问题并不突出。

^① 表4、表5所使用的工具变量与前文一致,表4第(2)(3)列和表5仅采用男性样本。

^② CFPS2020和2022将受访者的家庭人均收入由小到大排列并分成四等分,形成家庭人均收入四分位数。但由于每一等分的样本量较少,因此仅按照家庭人均收入分位数将样本分为中位数以下和中位数以上两组进行检验。

表6 家庭人均收入分组检验

变量	照顾孩子时长		亲子交流频率	
	(1)IV-Tobit 中位数以下	(2)IV-Tobit 中位数以上	(3)CMP 中位数以下	(4)CMP 中位数以上
母亲陪读	-5.470**(2.034)	-0.792(1.781)	0.740**(0.321)	0.028(0.391)
控制变量/工具变量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4.224(3.502)	9.986*(5.296)	-6.314*** (2.323)	-7.956*** (2.772)
观测值	1440	700	1447	700

(二)基于农村母亲非农就业情况的考察

作为陪读责任的主要承担者,农村母亲不得被束缚在家庭照料负担中,从而减少工作时间或彻底放弃工作^①。与此同时,孩子父亲作为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乃至唯一来源,迫于激增的家庭经济负担,更可能从事工作强度大、条件艰苦的工作,以提高收入来为妻子的陪读生活和孩子的教育提供经济支持。因此,本部分针对男性样本,基于农村母亲的非农就业情况对母亲陪读与农村家庭父亲育儿参与情况之间的关系进行再考察。表7第(1)列和第(2)列估计结果显示,无论农村陪读母亲有没有非农工作,母亲陪读的系数均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对孩子父亲的育儿时长产生负向影响,即农村陪读家庭普遍存在“父职物理缺席”现象,这可能是因为农村陪读母亲所从事的工作多是兼职性质,收入有限,农村父亲的务工收入才是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第(3)列和第(4)列估计结果显示,当农村陪读母亲没有非农工作,孩子父亲作为家庭主要乃至唯一的收入来源时,其更可能忽略家庭情感陪伴,亲子交流频率更低,更可能加剧“父职情感缺席”。

表7 农村母亲非农就业情况分组检验

变量	照顾孩子时长		亲子交流频率	
	(1)IV-Tobit 有就业	(2)IV-Tobit 无就业	(3)CMP 有就业	(4)CMP 无就业
母亲陪读	-2.694*(1.537)	-11.720*(6.075)	0.866*** (0.300)	0.564(0.461)
控制变量/工具变量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7.154** (3.267)	3.467(5.990)	-4.151** (1.885)	-7.114** (3.168)
观测值	1210	930	1214	933

(三)父亲育儿参与对孩子学业成绩的影响

教育作为农村家庭实现阶层流动的重要途径,送孩子进城读书和母亲陪读等一系列教育投资都是为了尽可能提升孩子的学业成绩,从而帮助其在教育竞争中获胜,实现子女乃至整个家庭的阶层跃升。然而,在我国日趋激烈的教育竞争和教育责任家庭化的背景下,学业成败不仅依靠学生个人的天赋和努力,关键还在于家庭教育投入能否有效转化成客观的学业成绩,而这一转化又依赖于健康的亲子关系^②。基于此,本部分进一步考察父亲育儿参与在母亲陪读对孩子学业成绩的影响中所发挥的作用,其中,孩子学业成绩由CFPS问卷中“孩子上学期平时的数学成绩”来衡量(四级赋值,优=1;

① 雷望红:《阶层流动竞争与教育风险投资——对甘肃宁县“陪读”现象的解读》,《中国青年研究》2018年第12期。

② 李佳丽、何瑞珠:《家庭教育时间投入、经济投入和青少年发展: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影子教育阐释》,《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第8期。

良=2;中=3;差=4)。为此,本部分采用有序Probit模型进行回归,并将农村父亲“照顾孩子时间”“亲子交流频率”及其与母亲陪读的交互项纳入模型。结果发现,母亲陪读的确能有效提高孩子的学业成绩,并且这一积极影响随着父亲与孩子交流频率的提高而增强,但父亲育儿时间在其中的作用则不显著,表明相较于实际育儿参与时间,育儿参与质量对孩子学业成绩的影响更为显著^①。

六、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中国独特的城乡二元结构和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所催生的农村学生进城读书及母亲陪读现象,是导致中国农村家庭人户分离和“父职缺席”的重要原因。但在中国特有的农村陪读家庭情境中,“父职缺席”表现出了与以往父职研究不一样的特征。既有研究普遍认为,父亲时空不在场即“父职物理缺席”往往伴随着经济、情感等其他类型资源的缺失,从而对幼年子女乃至其他家人产生诸多不利影响。但本研究发现,在中国特有的农村陪读家庭情境下,孩子父亲迫于生计压力外出务工或从事更艰辛的工作,虽然减少了其实际育儿时间,加剧了“父职物理缺席”现象,但却并未导致严重的父爱缺失,反而可能为孩子乃至整个家庭的发展带来经济和情感等资源的弥补。为此,需要基于中国农村家庭特定的情境,重新认识和辩证看待中国农村家庭的“父职缺席”。

研究表明:(1)农村母亲陪读显著缩短了孩子父亲的育儿时长,加剧了家庭抚育中的“父职物理缺席”;但农村陪读家庭父亲的育儿参与质量更高,“父职情感缺席”问题并不突出。(2)机制分析发现,母亲陪读加重了孩子父亲所肩负的经济责任,迫使其更为艰辛地工作,从而缩短了其实际育儿时长;但农村陪读家庭的高教育期望,提高了孩子父亲与孩子交流互动的频率。(3)异质性分析发现,对经济资本较为匮乏的普通农村陪读家庭而言,当孩子父亲作为家庭主要乃至唯一的收入来源时,其“物理缺席”和“情感缺席”都更为严重。(4)进一步分析发现,母亲陪读对孩子学业成绩的积极作用受到孩子父亲所提供的情感陪伴,即育儿参与质量的显著影响。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对策建议:陪读所造成的人户分离、父职缺失问题,以及追求收入增长与亲子教育的矛盾,几乎成为普通农村家庭共同面临的难题,未来应重点关注并采取有效措施化解陪读现象给农村家庭造成的不利影响和减少不必要的陪读行为。其中,以下三个方面的措施尤为重要:第一,政府应重视农村教育公平问题,努力改善城乡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的现状。例如,合理规划农村学校布局,给予偏远地区、教学设施落后的农村学校更多经费支持,提升农村学校教育质量,让农村低龄学生能够就近接受优质教育;同时,保障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享有与城市学生同等的义务教育机会,以减轻人户分离对农村家庭尤其是低收入群体造成的负面影响和子女抚育负担。第二,推动教育责任回归学校,鼓励学校更多地承担起农村中小学生学习课后托管、作业辅导等责任,减轻农村家庭的子女教养负担。第三,发展义务教育阶段寄宿制学校,保障安全良好的住宿环境以及营养均衡的餐食供应,满足部分因距离等原因需要寄宿的农村学生的寄宿需求,降低农村家庭的经济压力和教育负担。

^① 因篇幅限制,相关回归结果和图表未汇报,感兴趣者可联系作者。

Is Paternal Love Absent?

—The Impact of Mother Accompanying Study on Rural Father's Involvement in Child Parenting

Luo Biliang Liu Shiyu

(National School of Agricultural Institution and Development,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P.R.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educational urbanization, sending children to urban areas for education has gradually become a rigid choice for rural families. The accompanying phenomenon, where mothers of rural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relocate to the city where their children's schools are located, purchasing or renting housing to accompany and care for their children's lives and studies, has attracted significant academic attention regarding its impact on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within rural families, children's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the "father absence" phenomenon. However, empirical analyses on this topic have been scarc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formations in rural family child-rearing models, this article employs CFPS data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mothers accompanying children to study on fathers'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parental involvement. The research results reveal that in the unique context of rural accompanying study families in China, "father absence" demonstrates characteristics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studies. First, significant gender disparities exist in parenting time, with mothers' accompanying study substantially suppressing fathers' parenting duration, widening gender differences, and intensifying "physical paternal absence". Howev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renting involvement quality,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frequency and participation quality are higher in such families, with no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s, suggesting that "parent-child emotional disconnection" may not be severe. Mechanism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mothers' accompanying study increases fathers' economic responsibilities, compelling them to work more arduously and consequently reducing their actual parenting time. Conversely, high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in rural accompanying study families enhance fathers'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with children.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veals that in families with limited economic capital, where fathers are the primary or sole income source, "physical and emotional paternal absence" may be more pronounced. Further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at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mothers accompanying children to study on academic performance are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by fathers' parental involvement quality. Therefore,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developing effective measures to mitigate the adverse impacts of this phenomenon on rural families while adopting a nuanced perspective on "father absence" in Chinese rural contexts.

Keywords: Rural family; Mother accompanying study; Father absence; Fathers' parental involvement; Family rearing model

[责任编辑:王玲强 李清杨]